

上海三联书店

视点 7

吴士余 主编

协商民主

陈家刚 选编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视点
7

吴士余
主编

协商民主

陈家刚 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协商民主 / 陈家刚 选编:

(视点丛书 / 吴士余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7

ISBN 7-5426-1937-3

I. 协… II. 陈… III. 民主—研究—文集 IV. D0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7688 号

协商民主

选 编/ 陈家刚

责任编辑/ 刘宏伟

装帧设计/ 范矫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1.25

印 数/ 1—4000

ISBN7-5426-1937-3

C·59 定价 22.00 元

视点

——
策划人语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若说 21 世纪将是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是不为过的。世界文化格局承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重建新的架构,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它的一个显著效应将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人类文化在比较、融合、批判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因此,对话、交流、创新也将是 21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题词。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界阈将被冲破,学术文化的生态平衡将向现代形态倾斜和转变;学术思维的创造性和科学性,以及价值判断的认知理性与实践精神将更明显地

被凸现出来。

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对传统的、本土的文化遗产的反思与重构;二是对人类文明的世界性考量。这是因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衍生了诸多新的人文现象和思潮需要去考量、追踪和研究。学术文化的发展不应停留在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与总结上,而是要求学者能就新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新的人文现象、人文思潮作出迅速与理性的反应;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变革,并作出科学的应答。因此,文化交流、对话,广采博纳,审慎辨析,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以丰富自我,使中国学术文化多一些现代意识的内涵,就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以人文学出版为本位的上海三联书店理应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和繁荣服务。这也是我们在推出《三联评论》之后,酝酿和策划《视点》丛刊的初衷。前者意为为国内学界中坚和新锐提供学术创新的园地,后者则是介绍国外学界新的人文思潮和学术信息,为国内学人提供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企望将《三联评论》及《视点》丛书作为上海三联学术著述出版的两翼,来反映中青年学者在文化交流、对话以及文化承传和创新方面的成果。

《视点》是不定期的丛刊,强调人文学术的主题性,即每辑确定一个专题,约请专家编选国外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著述(或辑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作综合性的评述,为求在某一学术专题方面能给读者有一个较完整的介绍。除了评介新的学术理念和信息,还将对不同文化价值判断的学术考量作理性的选择;为满足青年学子对国外学术文化的了解,还将对一些新的学术术语(包括跨语际的释义)作浅近的诠释。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多层次与多元化需求提供服务,为国内学界的人文研究拓宽些学

术文化的思维空间。我们希望能跟踪当代国外学界的人文思潮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反映国外学者在这一课题上较高水准的成果。限于我们学识的肤浅,常常会留下种种遗憾。但对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去作不懈的努力和追求的。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是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在这方面,《视点》丛刊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在评介域外文化时,将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有由学术理念和课题研究所涉及的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此,《视点》丛刊将注意它对民族文化承传的负面影响;文化交流和对话也应对域外文化资源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与取舍;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可否认,因编者学术素质的局限,在选编中难免会出现疏忽和偏差,但尽量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去对待域外人文学术研究,这应该是要努力做到的。

但有一点要强调的是,《视点》丛刊所译介的域外学术文化并非是为了照搬、效颦,也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我们的本意是为自身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参照和比较。在抵御消蚀意识形态的“西化意识”的同时,积极审视、选择、吸纳有利于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建设的西方文明成果。笔者认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应包含着这种积极的出版意识。

吴士余

2001年4月

目 录

选编 / 陈家刚

· 理论经纬 ·

- 1 / [美] 詹姆斯·D. 费伦 作为讨论的协商
23 / [美] 詹姆斯·S. 菲什金 协商民主
43 / [爱尔兰] 梅维·库克 协商民主的五个观点
69 / [美] 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和文化多元主义

·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 ·

- 103 / [美] 玛莎·麦科伊 帕特里克·斯卡利
协商对话扩展公民参与：
民主需要何种对话？
121 / [澳] 卡罗琳·亨德里克斯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
141 / [美] 詹姆斯·博曼
协商民主与有效社会自由：
能力、资源和机会

· 文本解读 ·

- 167 / [美] 乔舒亚·科恩 协商民主的程序与实质
191 / [美] 约翰·费尔约翰 建构协商民主制度
217 / [美] 乔·埃尔斯特 协商与制宪

· 另类诠释 ·

- 239 / [美] 杰克·奈特、詹姆斯·约翰逊 协商民主需要什么
什么样的政治平等
267 / [美] 帕布洛·德·格雷夫 协商民主与惩罚
287 / [美] 小莱尔·卡特 协商民主能挽救我们吗?

· 前瞻领域 ·

- 297 / [美] 克里斯蒂安·亨诺德 法团主义、多元主义与民
主：走向协商的官僚责任
理论
313 / [英] 马修·费斯廷斯泰因 协商、公民权与认同

· 关键词 ·

- 335 / 陈家刚 协商民主新术语

作为讨论的协商*

「美」詹姆斯·D·费伦

王文玉译

如果你试图理解“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那么，你会立刻要给“协商民主”下个定义，但因此你也就陷入了应该怎样准确理解它的争论之中。尽管这些争论很有启发性，而且对那些感兴趣的人来说无法避免，但我这里将尝试利用另外的路径，绕过协商和协商民主应该解释的问题。我将会考虑下面的问题，在做出某些集体决策之前，人们可能拥有什么样的良好理由来讨论（discussion）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为此进行投票或利用其他与讨论无关的决策规则？换句话说，做出政治决策之前，讨论的意义或价值是什么？

*James D. Fearon, "Deliberation as Discussion", 选自 Jon Elster Edit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这些问题可能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认为，对于任何使协商民主更学术的思想感兴趣的人来说，寻找答案是一种有价值的实践。如果我们记住投票或其他决策前的讨论与没有从讨论中获益的简单投票之间的这种反差，尤其如此。

在决策做什么之前进行的讨论，其依据主要有六方面的原因或理由。也许理由还会有很多，但我认为，这六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它们还提供了所考察问题的有趣背景。

一个团体的人们可能会在做出集体决策之前讨论问题，其目的在于：

1. 揭示私人信息。
2. 减少或克服有限理性。
3. 推动或鼓励一种赋予需求或要求正当化的特殊模式。
4. 有助于在团体的监督下促进最终选择合法化，加强团体团结或促进决策实施的可能性。
5. 提高参与者的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
6. 独立于讨论结果，做“正确的事情”。

揭示私人信息

比如一个五人团体要去餐馆就餐。讨论这件事的明显理由是允许每个人表达他们想到哪儿吃饭的偏好。然而，考虑到投票也是揭示个人偏好信息的方式，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讨论事情可能比简单的投票要多得多。

首先，简单的投票可能在程序上对于通过讨论解决问题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种真正讨论，而且在立法机构（寻找餐馆只是个比喻）中都存在着程序。那么，

我将暂时假定一个程序——例如，建议每个人将其第一选择写在纸上，选择取决于多数人的决策；在票数均衡的情况下，餐馆的选择是随机的。为什么一个团体喜欢通过讨论来选择，而不是用这种或某些类似的方式进行简单的投票决策？

原因在于，讨论允许人们表达不同的偏好程度，即他们是否对特定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或无关紧要的感受。当然，投票体制可以被设计成允许人们表达对细粮而不是其他食物的偏好。比如，在征询每个人的建议后，他们将用 0—10 之间的数字依次写在每个建议上，然后，利用某些规则集中统计这些选票，最后选出获胜者。但是，我们这里遇到了一个普遍的关于投票方式的问题：如果他们首先讨论某个问题，那么，这个团体就知道哪种投票方式可能适合目前的特定问题。也许总存在着一种投票体制，它能够像普通语言允许的那样考虑尽可能多的信息而模仿讨论，但是，特定的投票体制需要考虑表达任何必将通过案例讨论方式而解决的特定问题的恰当程度与类型。那么，为什么会感到烦恼？为什么不简单利用丰富的普通语言去提出替代和表达偏好的程度呢？

因此，讨论的理由在于，当它不厌其烦地设置考虑同样表达范围和方式的投票机制时，它就能相对便利地揭示私人信息的细微差别。尽管存在某些不同，但对于任何一个立法机关都有责任预先实施的假定的投票程序来说，如果允许个人像自由讨论一样发布带有其个人特点的许多信息或私人信息，那么，投票程序将是罕见的。例如，如果你是赞成决策还是否决某个议案的立法者，你可能希望能够表达强烈的或微弱的偏好，也想知道其他立法者是否对结果也感觉相当强烈。如果在讨论中，另一个立法者说他（她）的选民强烈反对通过某个议案，那么，你可能就改变选择而不赞同这个议案，不管是由于利

他主义，还是你不太关心这个问题，或者因为暗含的互惠，或是因为社会选择使总体的满足和福利最大化了。

前述例子表明，为什么讨论作为一种揭示个人对于决策结果偏好的私人信息的方式是正当的。但是，这个观点同样也适合其他类型的私人信息。例如，就那些与不同选择的差异性结果的可能性，或这些结果的性质有关的因素来说，团体的每个成员都可能拥有私人信息，因此，做出有利于团体的正确决策就需要揭示这些私人信息。在餐馆的例子中，你可能凑巧知道最受欢迎的餐馆关闭了，或可能会很忙等等。在美国国会中，与普通议员相比，委员会成员尤其知道各种议案的可能性后果，前者也明白这些。正如关于偏好的私人信息例子那样，关于可能结果的信息，原则上是通过设计好的恰当的投票机制收集的，但是，需要讨论去设计这些机制，而且，这些讨论还能够得出其他相关信息。或者，如果团体预先就遵守投票程序，那么，这个程序也许无法充分或足够多地揭示出私人信息，因此，投票前的自由讨论可能是个好主意。

作为揭示私人关于政治选择信息的方式，讨论的主要困境在于，人们具有策略上的动机去错误表达其偏好和专业知识。在有争论的博弈理论著作和立法机构“喋喋不休”的谈话中，这个问题是核心的。在这些例子中，单个立法者拥有关于这个或那个法案可能性后果的信息，他可能通过谈话或提出特别的议案来表达这些信息。典型的结果是，通过讨论传递的可信性信息越少，谈话者区别于听众的关于决策结果的偏好就越多。直觉上，如果美国国会的成员宣称，他的研究表明需要大量的防务支出，那么，其看法将会受到认真对待，如果他是政治上的鸽派而不是鹰派的话。

根据这种逻辑，只有当团体成员不理解他们本身有相当多的分歧和冲突利益时，讨论作为一种揭示私人信息的方式才是有效的。否则，冲突的利益将会因为使人们（合理地）怀疑他人是否传递了有关其私人信息的实情而损害信任。

现在，像自由讨论一样，这些表达错误的动机也适用于投票机制——理性行为会承担使投票扭曲和不反映某人的私人信息的信息的责任，进而得到完善的社会结果，如果每个人的投票都是“真诚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投票是否优于讨论仍旧是不清楚的。假设存在偏好差异，因此促进人们传递错误信息，那么，选择之前的简单投票和讨论就能使团体保持良好状态吗？既有的著作，这里没有通用的答案。比如，吉利根和克雷比尔（Gilligan 和 Krehbiel, 1987）的研究结果表明，假设大家都提前知道该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比其他成员拥有更好的关于决策可能性影响的信息，尽管所有成员都有一些私人信息，那么，这个团体就可能理性地选择一种严格的修正程序，这种程序实际上不允许那些信息不完善的人发言，而给那些拥有更多信息的成员额外的决策权。这样一来，拥有更多信息的成员错误表达信息的动机就降低了，信息传递也就改善了。然而，奥斯汀和班克（Austen 和 Bank, 1996）的研究却提供了相反的例子，在其关于 Condorcet 陪审团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理性个体投票赞成或反对某些条款可能与其自己最佳的私人信息相反，尽管每个人都确实拥有对结果的相同偏好。这里，未经讨论的投票可能会戏剧性地导致次优结果，我不敢肯定，但我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被允许参与讨论，这种不合理的结果将会消失。

与私人投票相比，为什么人们在公开谈话中可能或多或少倾向于传递其偏好或知识的错误信息。一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困难。一方面，公开讨论能够培养人们的诚实荣誉感，但在关于可能性结果而不是偏好的私人信息情况下，诚实要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事实的经验检验，这样就产生了玷污名誉和真实表达动机的可能性。或者，社会习俗使人们发觉公开说谎是不舒服的，因此，如果有机会，讨论就可能提供一些信息，而私人投票提供的信息则较少。另一方面，不经公开讨论而进行秘密投票和匿名选举的基本正义在于，个人能够根据其良知投票，不会屈从于寻求社会一致的压力而错误表达其真实观点。当然，如果允许先讨论，然后再秘密投票，这样就既能够揭示信息，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良知。然而，这种体制可能会要求人们站在公众立场上，人们知道这是不真诚的，而且他们将私下投票反对。有些人可能无法对付这些认识差异，他们将为与公众保持一致而投票。另一个可能性是，与在复杂的投票体制中弄清楚怎样谋划相比，人们在普通的语言讨论中更便于错误传递其看法。因此，人们在公开讨论中传递错误私人信息是否比投票体制中具有更大或更小的动机还不十分清楚。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如果投票程序不允许像自由讨论那样详细揭示私人信息，对可能性结果的个人偏好不会存在如此分歧，以至于使讨论没有信息性和价值的话，希望做出集体决策的团体可能想讨论问题而不只是投票。

减少或克服有限理性

就许多集体决策而言，重要的问题不是人们拥有关于偏好或可能性后果的私人信息，而是难以了解最好的行为过程，因为问题非常复杂。例如，尽管人们能从医生、保险公司、病人、企业等地方搜集到各种私人信息，但是，怎样更好的改革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仍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并不简单，因为不同党派可能对分配利润和改革成本有不同的偏好。而且，即使任命一个具备各种权力和所有私人信息的医疗保健官员，他仍将面临着庞大的复杂的决策问题。他可能希望与其他人一起讨论应该做什么，不仅是为了得到私人信息，而且还希望讨论的过程能够澄清不同政策的可能性后果，并通过集体讨论提出完整的新思想。应该注意的是，人们很少希望使用投票。投票体制总是需要提前说明替代性选择是什么、讨论要揭示的是什么，而对于事件与结果的可能关系来说，投票可能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无效办法。

用赫伯特·西蒙的话说，讨论是消除有限理性影响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的想象和计算能力是有限和易犯错误的。所以，面对复杂的问题，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讨论而集中其有限能力，并增加做出最佳选择的几率。讨论可以减少有限理性的影响有两个理由。第一，它具有“附加”价值，因为你可能会考虑一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可能性，反之亦然；第二，它具有“倍增”价值，因为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认为问题或可能性不会发生在我们中的任何人身上。西蒙有限理性的核心例证就是象棋博弈。在通常的意义上，象棋中没有私人信息；而纸牌或桥牌则不同，它们的部分兴趣在于

参与者具有其手中牌的私人信息。

为了探求作为减少有限理性方式的讨论的核心作用，我们可以考察下面我称之为团体象棋赛的例子。想象一下二对二的象棋对垒，每个队都会在私下协商（*deliberate*）每轮要做什么。除了不正常的情况，似乎两人一队总是要比单个人一队要好些，至少一直在进步。增加更多的成员会更好，尽管这可能放慢速度。还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有效讨论障碍的威胁和社会压力的范围可能会相当有限，因为在象棋博弈中，与较弱的、更短视的观点相比，关于应该做什么的更强、更有远见长远的观点更能够客观地表现出来。因此，作为克服有限理性的方式，公开讨论对智力可能相当有利和负责。

在团体象棋赛中，每个成员都知道他们在赢得胜利而不是别的方面是一致的。然而，在立法机构和其他政治论坛上，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假设团队成员不仅在赢得游戏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在特定事情的命运方面也应该如此，那么现在，当存在冲突性偏好并因此而传递错误信息时，我们就会有与揭示私人信息的讨论类似的例子。我们在其中期望什么呢？这里存在着一些有趣的相似和差异。

关于相似，如果我的搭档说：“让我们开始玩……因为……”我就会有点怀疑。我担心尽管她的说法有根据，而且对团队是最有利的，但是这也许结果更有利于“她”而不是“我”。我担心这点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的搭档可能试图通过建议采取她期望出现的糟糕结果而不是说明揭示这种可能性的思维训练来欺骗我。在这个例子中，情况看起来与前面讨论的私人信息例子非常相似。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一旦思考复杂问题，我们就会拥有关于特定情景和可能性的私人信息，我们也就会产生传达某种错误信息的动机。很自然，

利益分歧越大，提供似是而非和不完整信息并试图说服对方的动机就越强，因此，怀疑“客观”观点的人就越多。

另一方面，我的搭档可能不是有意欺骗我，但是，她对自身的关心导致她探求有利于她而我很少考虑的路径。因此，她将会弄明白我们面临的复杂决策问题的不同方面，这将会使她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片面的”。这个例子不同于传统的私人信息问题，因为不是有意欺骗。相反，有限理性的一个后果就是自然偏见，这是可以通过讨论而修改和补充的。

与揭示私人信息相比，关于讨论在减少有限理性中的作用至少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在私人信息的例子中，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利益冲突，以至于讨论是无意义的，因为传递错误信息的动机太强了。当作出的决策足够复杂，以至于有限理性发生作用时，也许看起来并非如此。甚至在相反的利益中，讨论具有行为后果并导致真正的信息传递似乎是可能的。例如，想象一下象棋比赛中对手之间的讨论。一个对另一个说“小心你的车（象棋）”，试图去迷惑或欺骗对方，但是，甚至这个建议也会使对方想很多并影响着下一步的选择。普遍地讲，即使我认为立法机构中的演讲者有充足的理由试图迷惑我，但我们正在考虑一个问题，其中，有限理性是一个重大障碍，那么，我仍然会被现存的观点说服，因为它在客观上是强制性的。如果我的游戏搭档说“我们不应该走马（象棋），因为那将会丢失王后（象棋）”，这样能够说服我，即使我知道搭档喜欢王后——这种观点只是客观或理性的说明。

总之，一个团体想讨论一些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就此举行投票的原因是减少有限理性的影响，讨论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即使该团体中存在众所周知的利益冲突。尽管在有些例子中，